



《图谱》编写的一大突破在于注意到了制度文明，比如在现在出版的12卷《图谱》中，有8卷将法制单设一章。图为被誉为“中国第一部青铜法典”的青铜器匚联匚及铭文拓片。

◀（上接11版）

看，突破之处主要有三点：

突破之一是注意到了制度文明。黄正建说，《图谱》的编写目的之一，就是用文物展示中国古代丰富多彩、高水平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特别是制度文明，过去很少重视，其实这不仅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丰富经验，也是中国古代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他介绍，目前《图谱》各卷都有专章用文物展示制度。

比如，在张先生拟定的大纲里没有“法制”一章，在现在出版的12卷《图谱》中，有8卷将法制单设一章。在《夏商西周卷》中，作者任会斌选择了一张被誉为“中国第一部青铜法典”的青铜器匚联匚及铭文拓片。他介绍，1975年匚联匚出土于陕西岐山董家村一号青铜器窖藏，157字的铭文主要记录了周王的法官伯扬父对牧牛跟他的上司武官匚联打官司所作的判决。判案依据为当时的刑典，内容包括罪名认定和处理结果等，诉讼程序非常完备。“这篇铭文距今已有2800年，全面反映了西周的刑法和狱讼盟誓制度，是研究中国法律史的珍贵资料，说明西周已经存在着成文的法律和系统的刑罚。”

在《秦汉卷（上）》中，作者赵凯选择了一张睡虎地秦简《徭律》图。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竹简1155枚、残片80枚，其中大部分是秦代的法律条文、解释律文的问答及有关治狱的文书程式，是现在了解和研究秦始皇颁行全国法律的重要依据。赵凯还选择了一张《二年律令》图。《二年律令》于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在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记录的是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之前施行的律令，是人们了解汉初法令的一大依据。与之前的睡虎地秦简一起阅读，还能看到秦律在汉律中的继承。在《宋

代卷》中，有两幅北宋《天圣令·田令》和《天圣令·关市令》图。1998年发现的明抄本《天圣令》现藏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保存了《宋令》293条、《唐令》221条，有许多法律条文是现存史籍中未见记载的，还有不少条文比现存史籍所记更完整。在《元代卷》中，收录了一张《至正条格》的图片。《至正条格》是继《大元通制》之后元朝政府颁布的又一部律令汇编，元朝灭亡后，《至正条格》在中国失传，残本为2002年韩国国学中央研究院安承俊教授在韩国庆州调查古文书时发现，2007年由韩国国学中央研究院影印出版。在《辽西夏金卷》中，作者关树东选择了一张《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颁律表》图。《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1909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中发现的，又称《西夏法典》，原件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这部律令是西夏文刻本，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颁行的法典，也是西夏历朝法律的集大成者。在《明代卷（上）》中，作者栾成显选择了一张《御制大诰》，这是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写定的刑典，于明初洪武十八年（1385）十一月发布，每户一本，家传人诵。《大诰》整理了这一年审判贪腐方面的重大案件，以诰文的形式向全国发布，告诫官吏们不要重蹈覆辙。黄正建说，从西周匚联匚，经睡虎地《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北宋《天圣令》中的《唐令》《宋令》、元代《至正条格》、《西夏法典》，再到明代《大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用文物表示法制文明的体系，展示了中国自古就有发达的法制”。

突破之二是在内容上增加了社会生活史的比重。赵凯说，张政烺先生在1959年拟定的编辑计划中就已经明确将“一般人民生活（衣食住）”写入，显示出一代历史大家超越时代的卓识，而在业已出版的《图谱》

中，“展现人民生活的密集度远远超过了张先生拟定的目录”。他认为，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界对衣食住行之类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不太重视，但现在人们普遍理解历史不仅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由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构成的，这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另一方面，展现社会生活的文物资料也比较丰富。在他编著的《秦汉卷（上）》中，有一张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图，图中专门展示了当时的厕所。“读者通过这张图，可以直观地看到当时厕所的形状。”赵凯笑着说。

突破之三是对新材料的大量吸收运用，以及对时下主流学术观点和热点的关注。黄正建说，《图谱》尽可能吸取最新考古成果，出土文物的翻检和选择截至2014年（个别文物为2015年甚至2016年出土），凡是新发现的陶器、青铜器、简牍、文书、碑刻、壁画、陶俑，乃至藏于国外而国内以往少见的书画均择要收入。比如，秦二世胡亥继承帝位，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是赵高、李斯等大臣矫诏的结果。为了更全面地展现这段历史，赵凯使用了两条新材料，一个是北京大学藏汉代简牍《赵正书》，是2015年正式出版公布的；另一个是《秦二世继位诏书》，是2013年在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这两条新材料能够丰富我们对这个历史谜团的认识。”赵凯说。

《图谱》中的图片，除了可以对某一具体事件、制度进行展现，还能成系统地传达学术概念。比如展现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黄正建介绍，《图谱》以浩繁的篇幅、图文结合的形式，立体呈现了5000年来中华民族各地域、各民族文化间不断交融、汇流，进而形成多民族包容并进的单一制国家的历史进程。本套书各卷都给了少数民族文物一定的比例，辽夏金卷还是

专卷。在《图谱》中，对南诏文物、渤海文物、吐蕃文物等都做了专门介绍，管理西藏、统一台湾、钓鱼岛等都设有专节。“全书看下来，可以很明确地看出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

栾成显举例道，在他编写的《清代卷（上）》中，有一张“劝人恤出痘碑”图。该碑位于拉萨市大昭寺门前，由时任驻藏办事大臣的和琳立于清朝乾隆五十九年三月（1794），碑文记述了和琳在西藏拯救天花患者，并力图改变藏族平民天葬、地葬、罪犯水葬的习俗，推广土葬的努力。栾成显告诉记者，这张照片的来历也颇有纪念意义——1959年下半年，“图谱组”为搜集西藏的历史文物，由历史所牵头带领一队学者、摄影师组团赴西藏考察。“当时，张政烺先生为历史所赴藏人员在北京饭店谭家菜馆饯行，后来又去前门车站为他们送别。”他记得，后来以此次考察为基础，率先编成《西藏——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呈报上级部门，可惜的是，这些材料多在“文革”中散佚。

比如，在《秦汉卷（上）》中，收录了一张朝鲜《论语》竹简图。这部《论语》是20

世纪90年代在平壤古墓出土的，为公元前45年汉四郡时期乐浪郡下层官吏的随葬品，是迄今朝鲜半岛发现的最古老的《论语》遗存。赵凯说，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开始上升为官方学说，“平壤简《论语》”的发现，为研究东亚古代社会汉字文化与儒家思想的传播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王曾瑜告诉记者，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学术观点有所变化，并形成了新的学术热点，这在《图谱》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在《图谱》中没有“农民起义”、“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的提法。

问题五：《图谱》的读者是哪些人？

答：“老少皆宜。”黄正建答道，除了专业人士，“喜欢历史的普通读者也会喜欢读这部书”。

在黄正建看来，展现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内容对普通读者特别有吸引力，而这部分内容在《图谱》中极为丰富。比如，在《隋唐五代卷》中，就有一个章节专门写到了唐代妇女的装扮，其中有一句：“除少数民族外，戴戒指的不多，戴耳环的则几乎没有。”黄正建说，许多人读到这段时都表示出乎意料，因为在不少影视剧中，“唐女”都是戴戒指、耳环的，但这与历史事实不符。他解释，从先秦开始，中国人就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所以人们的耳朵不能随便打洞。“影视剧的古装造型，也可以从我们的书中找到指导。”黄正建笑着说。

王曾瑜提议，可以将《图谱》列入海外孔子学院的阅读书目。“《图谱》是一部对外宣传和传播中华古文明的绝好教材，世界各地办了许多孔子学院，可以为每个学院配置一部至数部。”他希望《图谱》将来能推出英文版。



《图谱》编写的另一突破是在内容上增加了社会生活史的比重。比如，在《秦汉卷（上）》中有一张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图，专门展示了当时的厕所。